

“诗教”传统的当代转化

刘利侠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当代《诗经》教育不仅在于用先秦时期朴素的人文关怀打动人, 用克制、理性的道德自觉感染人, 还应从传统“诗教”中吸收经验, 从传统诗学中汲取营养, 以守正创新的态度, 构建属于新时代的内涵体系。同时, 对于宗法制背景下《诗经》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精神的不合时宜之处, 如“温柔敦厚”的教育目标、“宜室宜家”的女性意识等, 应予以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以上观点, 应充分融入到《诗经》教育中的目标确立、篇目筛选、文本解读及教育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

[关键词] 《诗经》; 诗教; 诗学; 温柔敦厚; 兴于诗

[中图分类号] G 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3) 02-0052-09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一方面在移风易俗, 提升国民的精神涵养; 一方面在赓续文化血脉, 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在当前经典学习日益被重视、学习风气日益浓厚的情势下, 其必要性毋庸置疑, 其目标、要求、方法和路径, 却亟需理性、深入地讨论。同时, 经典的精神内涵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适应性亦不容忽视。本文即以《诗经》为例, 分析文化经典教育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传承与转化的相关问题。

一、先秦“诗教”经验与理论探索

“诗教”专指《诗经》的教育功能, 源于《礼记·经解》中孔子所说的“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 诗教也”^①。先秦“诗教”, 可分为两大阶段: 一是西周的礼乐教化, 二是春秋时孔子的《诗经》教育。二者蕴含着不同的教育内涵, 对当代《诗经》教育及人文素质培养, 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

(一) 礼乐教化的艺术教育经验

西周礼乐教化虽然年代久远, 但典籍中论述颇

多, 其内涵不难把握。这一时期, 《诗经》与《乐》合为一体, 以“乐”的形式, 成为“礼”的载体。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以声为用的《诗经》的传统——也就是《乐》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经》的传统古久得多, 影响大得多”^{[1]185}。

《礼记·乐记》记载: “先王之制礼乐也, 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 将以教民平好恶, 而反人道之正也”^②。此处否定了礼乐的娱乐性, 强调其教育功能。施“教”者为周天子, 受“教”者为“民”。而教育目标是“平好恶”“反人道之正”, 即统一价值标准、端正人的思想。先秦时, “教”往往又与“化”相提并论, 所谓“教行于上, 化成于下”。“化, 从匕人”, “匕, 从反人”^③, 会意为人由反而正, 即“反人道之正”的意思。“教化”可解释为《诗序》所谓“教以效化”。所谓“效”, 《说文解字》解释为“象也”, 段注“象当作像……像, 似也。毛诗: 君子是则是效。又民胥效矣……彼行之而此效之”^④。“效”是对规范的行为和思想的学习效法, 以此反观和纠正自己。

[收稿日期] 2022-10-07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目标导向的高校文化素质核心课程体系构建”(3200/Z821275)

[作者简介] 刘利侠(1973—), 女, 陕西凤翔人,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诗学、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播。

①陈澧注. 礼记[M]. 上海: 山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73.

②同①206.

③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384.

④同③123.

《诗经》为“教”提供了目标和内涵，而“教”的实施和保障，则依赖于《乐》的配合，共同作用于人的心理：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①

音乐最大限度调动了人的感性认知，“它与听众‘用直接的心灵语言’进行交流，因此才能打动后者，在他的心中引起欢愉、悲伤、哀痛等情感，引起千变万化的情绪及其变态”^{[2]437}。这种情绪的激荡，有效弥补了《诗经》作为文本在情感传递中的不足，即作为“内心中的观念和观念本身”，达不到“音乐造成的心灵的亲切感”，从而要借助音乐这种“感性观照和无言的心领神会来弥补它的不足”^{[3]358}，对观念传递进行强化，使受教者接受文本的立场，思想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在价值观教育之外，古人对音乐之于个体性情的涵养作用深有体会。《礼记·乐记·乐化》记载：“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②。“易”指平易、随和；“直”指坦率、真诚；“子”通“慈”，指悲悯、关爱；“谅”指宽厚、包容。这些优秀品质的养成，正是人们在艺术体验中，与创作者发生共情和精神交流的结果。由于艺术欣赏是纯粹超功利的审美，人们“会松弛现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紧张和激动情绪”，从而培养出一颗良好的心态，“以此净化他们的内心世界”^{[2]215}。易、直、慈、谅，实质是人与人之间温和、友善、真诚、宽容的态度，是儒家所崇尚的“温柔敦厚”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

（二）孔子“兴于诗”的文学教育理论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诗教”也因失去政治的依托走向衰落。孔子是礼乐的倡导者，也是“诗教”的传承者。他将天子之教运用于私学，教育对象由大众的“民”转向“士”。

这一阶段，《诗经》和《乐》呈现分离状态。孔子施教，立足文本，“不学诗，无以言”^{[4]396}，《诗经》被作为雅言的典范，用以培养学生的辞令和交际能力；《诗经》又有“观风俗，知教化”的作用，对参与地方治理有重要的资讯价值，因此“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305}。

“兴于诗”是孔子“诗教”的核心思想。“兴”，段注“托事于物”^③，与朱熹所说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5]1}大体相符，指诗歌特有的抒情手法，即将所言之情事 B，托附在它物 A 上，在 A 与 B 含义的跳脱中，给读者拓展思维的空间，通过联系、想象等方式来填补和完成（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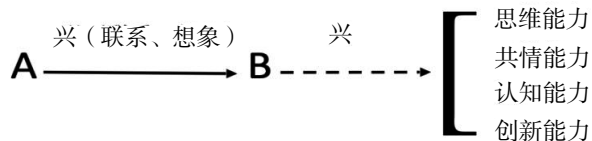


图1 “兴”的思维逻辑

“兴”是一种体验式阅读的过程，这一过程训练了读者的思维，培养了其共情能力，提升了其认知，开拓了其创造能力。

《论语·学而》中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以及《八佾》中孔子与子夏的对话，都是典型的“兴”的例子（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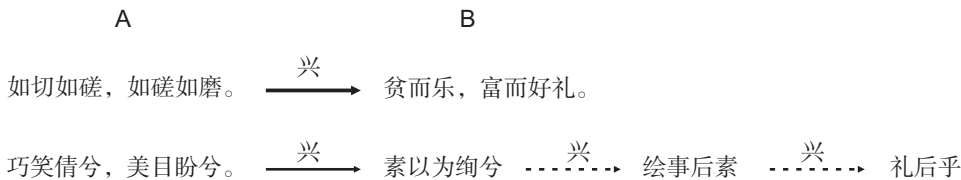


图2 《论语》中的兴

① 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5-17。

② 陈澧注。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9。

③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05。

子贡由《卫风·淇奥》中所描写的雕琢玉器的过程,联系到君子砥砺自我、止于至善的道理^{[4]45};孔子由《卫风·硕人》中所描写女子之天然之美,联想到“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进一步联系到“绘画之事也,后于素也”,子夏则进一步发挥为“礼后”的哲学思想^{[4]82}。随着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拓展,作品的内涵得到更加丰富深刻的阐释,个人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得到提升,便可以用更高的眼界观照世界和人生,即“可以观”;个人对他人更为理解和尊重,与人和谐相处的能力也得到培养,即“可以群”;个人能够更加深刻、理性地认识、反思和评价现实,用适当的方式去排解不满的情绪,即“可以怨”。“兴”是方法和路径,“观”“群”“怨”是所达成的目标(图3)。《诗经》的体验式阅读不仅可以启发学生对于生命价值、道德伦理、社会历史问题等的理性思考,同时也实现了涵养“温柔敦厚”性情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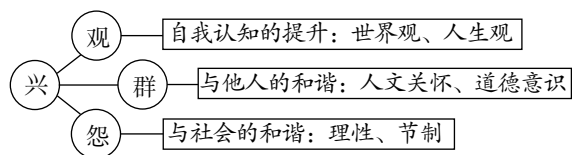


图3 “兴”的内涵延伸”

西周的礼乐教化偏重于通过音乐的力量,调动歌唱者的感性和直觉,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孔子的“兴于诗”则更重视通过启发式的讨论和思考,调动学生的理性思维,使其自觉和领悟。前者以“教”为主导,后者以“学”为中心,前者适用于人在认知水平较低阶段或无法进行教和学深入交流的场景,后者则要求学习者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教和学可以良好互动,进行思想碰撞。

秦之后,汉代“独尊儒术”使《诗经》的文化地位和重要性更为突出,但汉儒政治色彩浓厚的文本阐释及之后适应仕途经济的功利化教育,使以“人”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功能逐渐弱化。即使还有以“诗”为教的例子,“多半也是‘兴于《诗》’,而以孝思为主。这些都是实践的温柔敦厚的《诗经》”^{[2]182}。

二、“温柔敦厚”教育目标的当代反思

“温柔敦厚”被视作先秦“诗教”的目标。“温”“柔”“敦”“厚”四字都是从主体对待客体的情感态度出发的描述:“温”,本为一种触觉感受,通感为心理感受,感情不强烈也不冷漠,表现为面色温润,即孔子所谓“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①;“柔”本义为“木曲直”,指树木材质柔软、可曲可直,表现在感情上为不固执、不对抗,通过自我调适使主客体的意志达到和谐,即“情性和柔”。两者比较,“温”指主体对感情有所节制,“柔”指意志上一定程度的顺从,其目的都是达到主客关系的和谐。“敦”《说文解字》强调“凡云敦厚者,皆假敦为惇”,认为“敦”是“惇”的假借。“惇”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厚也”,笔者认为欠妥。“惇”从心从享(《说文解字》以为“从心享声”),“享”亦有表意作用,是“献也。下进上之词也”,故而“惇”指下对上恭敬、谦卑的态度和感情,即“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厚”则指感情的程度,与“薄”相对,一训为“重”,指尽心尽力,二训为“深”,指体谅同情,与“忠”“恕”近似。总之,“温柔敦厚”的核心,是“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6]63}。

“温柔敦厚”既是西周政治教化的目标,也是儒家所崇尚的君子人格,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所共同信奉的人伦准则,并且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埋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要得到复苏和彰显。因此,立足当下,用新时代的眼光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极为必要。

对“温柔敦厚”的反思,孔子时已经开始。《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所言“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②,可见“温柔敦厚”需要破除“愚”。至于何为“不愚”,古代学者解释为“谏谏”,即委婉、适度的劝谏。如黄庭坚所说

① 陈澧注. 礼记[M]. 上海: 山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38.

② 同①273.

“其发为讪谤侵袭，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过，乃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①，这里的“愚”便有了“徒以直言获罪，而无补于事，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7]的意思，与“直”相近，指不妥协、不顺从的顽固态度，需要放弃和改正。以上解释虽反映了君主专制下“文人们趋向于尽量掩饰主体与迫害者实际存在着矛盾对立状态，尽量避免正面表现自己对统治者可能产生的不满与怨怒”^[8]，实则经不起推敲。首先，文人与迫害者关系的形成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与宗法制血缘姻亲维系的等级关系不符；其次，也与孔子所崇尚的君子人格相悖。

《论语》中描述孔子“温而厉”^{[4]157}，态度温和而内心坚定，在原则性问题上坚持自己，决不妥协和顺从。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4]224}。有德行的人，一定要发声，要“当仁不让于师”^{[4]250}，要勇敢，“勇者不惧”^{[4]176}。他反对人云亦云，主张思想独立，“乡愿，德之贼也”^{[4]264}，“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4]248}。他讨厌任何语言上的矫饰，“巧言令色鲜矣仁”^{[4]82}。在他看来，“君子和而不同”^{[4]221}，“道不同，不相为谋”^{[4]251}。以上都与“温柔敦厚”形成互补，可作为“不愚”的注脚。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早在2500年以前，孔子就已经意识到，根植于等级制度下的“温柔敦厚”虽然在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却必然造成个体意识的弱化以及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缺失，因此提出“以直报怨”“当仁不让”等观点，鼓励士阶层坚持真理、勇于担当。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形成后，等级意识经历长久的强化锤炼，孔子所谓的“不愚”非但未曾实现，“温柔敦厚”最终造就了令当代思想者痛心疾首的愚弱国民性。1920年罗素来到中国，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幕：

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坐成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

费的。^{[9]158}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种“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把压迫当作必然，面对苦难欣然接受的代名词，对外“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只有冷漠和麻木^{[10]183}。因此，对“温柔敦厚”的反思，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扬弃，并且触及到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民族精神重建的重大命题。“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11]429}，我们要思考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这是时代赋予当代文化学者和教育者的使命。

三、传统“诗学”与《诗经》的当代阐释

（一）传统“诗学”的当代审视

传统“诗教”与“诗学”相辅相成，“诗教”为“诗学”提供了目的，“诗学”为“诗教”提供了内涵。西周的“诗教”和孔子的“兴于诗”，充分发挥了《诗经》的艺术教育价值。到汉代，儒学成为统治哲学，《诗经》作为服务统治的工具，政治教化功能被过分夸大。如《汉书·儒林志》记载：

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12]708}

王式作为昌邑王（汉废帝）的老师，将《诗三百》作为劝谏的工具，诗歌内容被简单概括为“忠臣孝子之篇”和“危亡失道之君”。这种做法得到当权者认可而免罪。政治的需要与汉儒解经互为支撑，看似抬高了《诗经》的地位，实则削弱了其教育价值和艺术魅力。

汉代经学家解经，毛诗影响最大。同样，历朝历代的经学家也都出于各自的需要，对《诗经》的题旨进行发挥，造成“诗无达诂”的局面。以《魏风·十亩之间》为例：

《毛诗序》：“《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

① 黄庭坚著，屠友祥校注. 山谷题跋 [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48.

小,民无所居焉。”朱熹《诗集传》:“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何楷《诗经世本古义》:“齐姜劝晋公子重耳去齐也。”姚际恒《诗经通论》:“类刺淫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夫妇偕隐也。”今人或谓情诗恋歌,采桑者之歌^[13]132-133。

同一首诗,古今学者的解读可谓大相径庭(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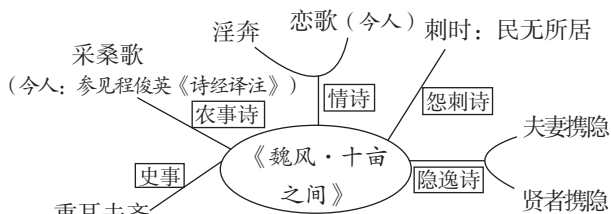


图4 《十亩之间》题旨解读的多样性

正如赵逵夫先生所说,“虽然我们从历代学者在《诗经》研究的看法中了解到各个时代意识形态、思想风气方面的变化,但未必于我们正确地体会和理解《诗经》中的作品,认识《诗经》这部书有益”^[14]序1。

宋代之后,学者开始对汉代经学提出质疑,其中朱熹对《诗经》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让诗旨离文本略近了一层,但其评价道学意味太重,人文精神缺失。明代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又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将所有篇目附会于历史事件,罔顾其文学本质。相比较而言,清代诗学家略胜一筹,尤以方玉润为翘楚:其一,他立足文本,“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反复涵咏”“循文按义”,以“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不是“以意逆志”,穿凿附会^[15]自序2;其二,他认为读诗要“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复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16]凡例2,反对断章取义,同时从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对《诗经》的艺术性加以分析;其三,他主张“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的“默会贯通”^[16]凡例2,重视直觉和感受,通过共情加深对《诗经》的理解,回归到文学阅读的本位。虽然如此,作为传统文人,方玉润解诗的思想仍然有很多不合时宜之处。

胡适先生在论及两千年来的经学时说:“虽说是进步的,但是都不彻底”,“我们应该拿起我们的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去大胆地细心

地研究,我们相信我们研究的效果比前人又可圆满一点了”^[16]17。时至今日,属于新的时代的《诗经》之学仍未到来。程俊英先生的《诗经译注》以及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完全抛弃传统诗学成果“就诗论诗”^[17]前言9的解读,因流于浅俗而失去了风雅的旨趣。

当代对《诗经》的解读,需处理好与传统诗学的关系。首先,要认识到《诗经》既是一部文学经典,同时又具有礼乐文化的思想根基,与儒学有必然的密切关系。汉儒出于政治需要过于牵强的附会固然不可取,全然忽视《诗经》的道德内涵则是矫枉过正。其次,《诗经》中的作品来源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其中的民歌真实展现了周人的精神风貌;贵族们的抒情诗蕴含着对生命、自我、社会和政治的深入思考和批判;礼乐颂歌则是对道德观念、政治伦理、宗族情怀的宣扬。可以说,《诗经》的内涵丰富多元,其中的人文情怀、批判意识和道德伦理都应得到充分发掘。其三,当代的《诗经》解读要以满足当代精神文化需求为主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要反思、批判、创新与继承相结合,即“倡导创新与守正相结合,以守正为创新的基础”^[14]序2。

(二)当代文化语境下的《诗经》阐释——以婚恋诗为例

宗法制血缘和姻亲维系的社会关系使得家庭的核心地位被强调,婚恋诗也成为《诗经》最主要的内容。被称为“正风”的“二南”,“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4]263,“齐家”诗占70%以上。《邶》《鄘》《卫》《郑》《陈》诸风,大部分也是婚恋诗,《秦风》《唐风》《豳风》《小雅》也都有经典作品。

《诗经》中的婚恋诗被孔子之后的经学家“以意逆志”,曲解、附会,抹杀了其应有的意蕴。以《周南·汉广》为例:

《小序》谓“德广所及”,《大序》因谓“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集传》以下诸家莫不本此,以为江汉游女,非复前日所求,以见文王之化之广矣。然“翘翘错薪”数语,终无着落,岂虚衍哉……姚氏际恒谓“古者宾客至,必共其刍薪。薪以为爨,刍以秣马”,是以游女为宾客矣……殊不知此诗为刘楚、刘蒹之人而作,所谓樵唱也。^[15]86-87

《汉广》作为一首绝美的爱情诗,令经学家大

费周章。其困难就在于一首纯欲纯情之作，如何满足政治、伦理以及男权视角的多种需求。毛传一脉认为诗中突出了“礼之大防”，男子对游女的追求似乎为“礼”阻隔，故而发出“求而不可得”的怅叹，是另一种“发乎情止乎礼”，于是盛赞文王教化之功。这样的解读，于理虽通，却忽视了诗中“刈楚”“刈蒺”诸多细节。姚际恒认定为待客之礼，推导出“游女”是宾客，非男子爱慕的对象，“其女子自有夫”。方玉润以为无稽之谈，断言此诗是写给樵夫唱的劳作之歌，“中间带言游女，则不过借以抒怀，聊写幽思，自适其意云尔”^{[15]87}。如顾颉刚先生所言，“《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16]24}。

《汉广》一诗，若立足文本，综合经学家的观点并加以甄别筛选，其题旨亦不难把握。诗人在思慕游女、求而不得的情感背景下，以乔木、翘楚、蒺草比喻游女，称颂其人格之高尚、人才之出众、品行之芳洁，表露“虽为执鞭所欣慕”^{[15]86-87}之情；又以伐薪、秣马抒写永不言弃之的志向。诗歌抒写的“知其不可求，而心向往之，并且是无限向往”^{[18]25}的情志，是时人所崇尚的爱情境界，推而远之，未尝不是一种执着的追求的精神，一种高远的生命的境界，令今人望尘莫及。

《诗经·国风》中的情诗，随各地文化背景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周南”得“性情之正”，既尊重人的原始欲望，盛赞两性之间纯洁美好的情感体验，又能节之以礼，使感性与理性、个体需求与社会规范之间达到契合。

社会发展到今天，男尊女卑的旧制度已打破，但是建立在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先进的性别文化并未真正形成。同时，受到功利主义的侵蚀，两性关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离婚率攀升、结婚率低迷，人们甚至对婚姻关系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此，梁漱溟先生在半个世纪前早有预见：按照农业社会生产关系缔造的家庭结构，在工业时代，“事实就不那么需要，几乎有解散的样子”。然而，他又说：

婚姻制度之起源与要点，其所以不容消灭者，盖以礼也。比如我们的情，在所谓两性之好合，是真切，是恳挚，其心理自然之要求，是要求一个郑重的表示，就是一个礼……郑重之表示是出于真情，要是不郑重，也可说没有情也。^{[19]104-105}

“礼”是“情”的延伸和外化，也是保障和升华，失去“礼”保障的“情”，只是欲望的满足，失去了“善”的意蕴。在当代，我们不仅要肯定“礼”的精神价值，还要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层的发掘和改造，剥离其与宗法制等级文化的关系，发扬其对情人欲的理性节制作用。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其“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化精神（图5）依然是当代两性关系的典范，将在缔造新时代的性别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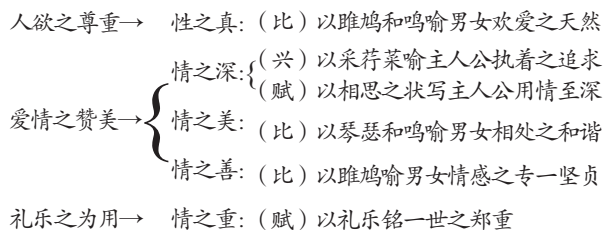


图5 《关雎》中的性、情、礼关系

郑、卫两国“因为受殷商文化的浸淫”，“观念比起受周礼控制的周文化圈腹地人群的观念要开放和灵活，男女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14]232}。陈国第一任国君胡公娶周武王长女大姬，大姬因无子而好巫覡祷祝，受其影响，“其声淫放不振”^{[20]1155}，故“《陈风》所歌之事，最近于郑”^{[21]84}。因此，郑、卫（含邶、鄘、卫）、陈三国情诗自由、奔放，纯欲、纯情，更有一种荡人心旌的艺术魅力。对于被物质欲求扭曲异化的当代人而言，这些诗歌不论是感性、激情，还是理性和节制，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滋养。

四、当代《诗经》教育的实施策略

先秦的“诗教”，凸显了《诗经》重要的文化地位。西周的礼乐教化以诗乐结合的形式传播礼乐文化和道德观念，以期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人文环境。孔子“兴于诗”则充分挖掘《诗经》在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内涵，达成价值观教育、素质培养和综合能力提升等多方面教育目标，以此实现对“士”即文化精英阶层的教育，培养优秀的参与社会治理的人才。由此可见，较之《书》《礼》《易》《春秋》等文化经典，《诗经》的教育对象更为宽泛，

教育功能更为强大,教育目标也更为多元,在当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其教育价值更应得到重视和充分发掘。

(一) 目标导向的分类教育

鉴于先秦“诗教”经验,《诗经》教育可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和实现路径(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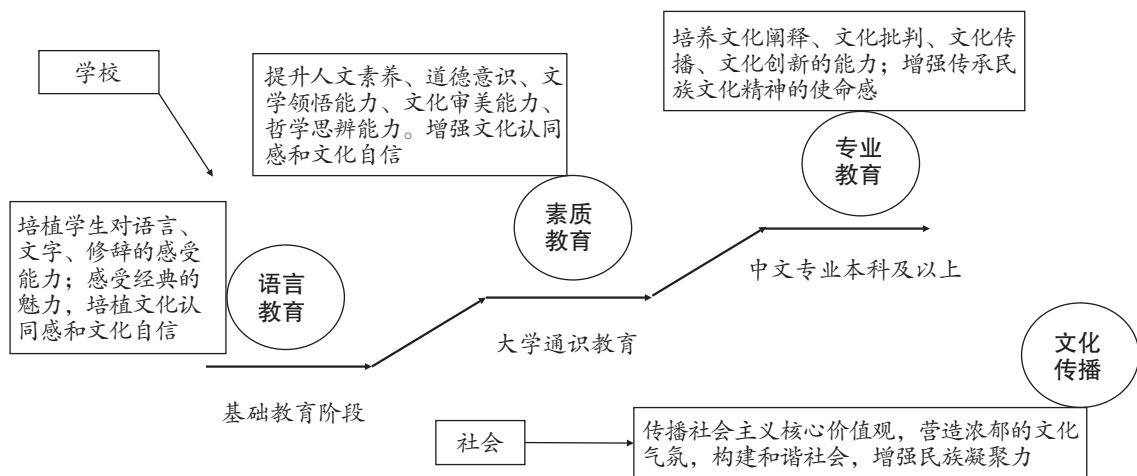


图6 目标导向的《诗经》分类教育

《诗经》首先可作为语言教材。孔子时期,“诗言志”在上层社会盛行,使《诗经》成为政治外交中的辞令范本。这段历史虽已远去,却颇有可借鉴之处:其一,《诗经》的语言典雅、活泼,四字结构和双声、叠韵使之读来朗朗上口,颇有音乐之美,适合诵读和歌唱;其二,《诗经》的章句精辟隽永,如“棘心夭夭,母氏劬劳”^{[16]32}“嚶其鸣矣,求其友声”^{[16]170}“执子之手,与子偕老”^{[16]31}等,可以启发情志;其三,《诗经》的体物、修辞堪称绝妙,如“逃之夭夭,灼灼其华”^{[16]8}“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6]57}“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16]154}等,是培养学生的语言感悟和运用能力的绝佳素材;其四,《诗经》较好地保留了文字初创时期的意义,可以引导学生追根溯源,感受汉字文化的魅力,提升语言素养。

《诗经》的语言教育功能适合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建议小学摘录朗朗上口的句子作为背诵材料,中学则选择意境优美、语言浅显的篇章组织学生进行诵读或演唱,对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大有裨益。

大学的《诗经》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专业教育主要针对中文类学科本科及以上学生,教育目标是培养文化传承者和传播者。学生不仅要做到熟识章句,对经学体系深入了解,还要对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作深入探究,具有解读阐

释、反思批判和文化创新的能力。非中文类专业学生的《诗经》学习以素质教育为目的,主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道德意识,增强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也可以将《诗经》作为文化经典,通过讲座、沙龙、书籍、影视等多种形式,借助网络技术和融媒体手段在全民中广泛传播,以此改善受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影响的文化风气,提升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二) 价值批判与内涵重构

1. 对“温柔敦厚”人格的批判继承

“温柔敦厚”作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也是《诗经》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温柔敦厚”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柔以待、真诚笃实的处世态度以及克制、理性、利他的处世方式,未尝不是“友善”“诚信”“敬业”“爱国”“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应继承和大力弘扬。

同时,要消弭其“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6]65}的不良影响。一方面,要发掘《诗经》中所蕴含的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在选篇时不仅要有“正风”和“正雅”,还要有“变风”和“变雅”,对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另一方

面,教学时要结合一定的文化反思,多进行开放式讨论,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

2. 等级制度下的道德观平议

《诗经》虽产生于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土壤之中,所幸那是一个“纳上下于道德”^{[22]192}的时代,道德作为纲纪天下的手段,从天子到庶民,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礼不下庶民”的观念使得贵族作为担荷道德的主体,成为被监督的对象。如《小雅·鹿鸣》描写天子与诸侯宴饮的场景,彰显了主客之间的以礼相待、互敬互爱的和谐关系。《周南·樛木》歌颂君子谦卑的态度和上下间团结协作的关系。《诗经》中所颂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尊卑、上下、长幼,也少有君主专制下的顺从和奴化,表现出高度的道德自觉和尚善的勇气,当代人应该继承和发扬。

3. 对性别文化的反思和纠正

《诗经》中等级观念的消极影响集中体现在婚恋诗中。虽然大部分诗歌崇尚美好、互敬、和谐的两性关系,但男尊女卑的伦理基础极为明显。如《周南·葛覃》《唐风·葛生》等诗将女性比作攀援而生的藤蔓植物,强化女性的依附性,《周南·桃夭》《召南·鹊巢》等诗将“宜室宜家”作为女性生命价值的唯一体现,《小雅·斯干》中体现出的弄璋、弄瓦的男女之别等,其观念影响至今,阅读时应理性甄别,反思纠正。

《诗经》有一部分诗歌描写宗室女子的婚姻。如《召南·何彼秣矣》中的王姬、《卫风·硕人》中的庄姜、《邶风·君子偕老》中的宣姜,她们作为政治的工具,与诸多的弃妇形象一样,是那个时代女性悲剧的缩影。阅读者在寄予同情的同时,需要从制度和层面作出深刻反思,树立性别平等和女性的独立意识。

(三) 面向时代的内容和选篇

《诗经》305篇被古人奉为圣典,但在今天看来,一些诗歌因年代久远,主旨难以把握,一些诗歌具有思想局限性,不适应当代精神文化的需求,还有一些诗歌因为篇幅较长或语言艰涩,不好理解。因此,通过篇目的筛选,系统化地搭建内涵体系,有助于教育目标的达成和经典的广泛传播。

1. 历史文化类

《诗经》中一些诗歌记载了上古时期朴素的宇宙观及社会理想,学生通过学习和阅读可以把握民族文化根基,提升认同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如

《大雅·生民》《商颂·玄鸟》以及《周颂》的《清庙》《丰年》等篇。

2. 政治道德类

一些诗歌赞颂民本思想和道德观念,弘扬人与人之间真诚友善、理性和谐的相处关系,是树立道德意识,培养友善、诚信、敬业、和谐的价值观和人格品行的经典文本,应当大力弘扬和传颂。如《小雅》中《鹿鸣》《伐木》《青青者莪》,《大雅》中《灵台》以及《卫风·淇奥》《召南·甘棠》等篇。

3. 战争农事类

《诗经》中的征夫珍视生命,向往和平美好的家庭生活。他们渴望战争的胜利和结束,将保家卫国、死亡之痛、征战之苦和对爱人、亲人的思念等诸多体验表达得深切、真实,反映了中华民族最朴素、纯真的生命欲求,如《邶风·东山》《小雅·采薇》《邶风·击鼓》《秦风·无衣》等。《邶风·七月》是农事诗的代表,对农人平凡岁月苦辣酸甜的内心感受揭示得厚重、真切。这些诗歌,读之令人感同身受,悲悯之心、家国之情、生命之爱油然而生。

4. 婚恋家庭类

《诗经》中的大部分婚恋诗既描绘了爱情的美好,又突出周代人“发乎性止乎礼”的“人道之正”。被物质欲望异化的当代人可以细细品味,既是对灵魂的洗礼,又是对美好的精神境界回归的召唤。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对缔结新时代和谐美好的两性关系,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情诗如《周南·汉广》《召南·野有死麋》《邶风·静女》《邶风·桑中》《王风·采葛》《郑风·东门之墀》《郑风·子衿》《郑风·出其东门》《郑风·野有蔓草》《郑风·溱洧》《秦风·蒹葭》《陈风·东门之杨》《陈风·月出》《陈风·泽陂》等,婚姻家庭诗如《周南·关雎》《周南·卷耳》《卫风·伯兮》《郑风·女曰鸡鸣》《唐风·绸缪》等。

5. 哀怨讽刺诗

这些诗以道德为准绳,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即朱熹所指的“变风”和“变雅”。学生阅读此类诗歌,可以培养同情悲悯之心、道德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并且学会理性地表达不满和平复自我情绪。即孔子所说的“可以怨”,对改良社会风气、增进社会和谐极为必要。如《邶风·式微》《邶风·新台》《邶风·君子偕老》《王风·黍离》《陈风·株林》《邶风·鶉之奔奔》《大雅·板》《大雅·荡》等。

6. 其他题材的诗歌

《诗经》内容极为丰富, 后世主要的诗歌题材都已出现。生命主题如《唐风·蟋蟀》《曹风·蟋蟀》, 隐逸诗如《邶风·式微》《卫风·考槃》《陈风·衡门》, 田园诗如《魏风·十亩之间》, 山水诗如《小雅·鹤鸣》, 歌颂母亲的诗《邶风·凯风》, 送别诗如《邶风·燕燕》等。这些诗歌探究生命的价值, 抒写人情之美、自然之美、闲适之美、孤独之美, 赞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同时, 这些诗歌为后世相同题材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上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 《诗经》作为文化经典的代表, 虽打上了特定时代历史和政治的烙印, 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 所记录的上古人民用纯净的目光、朴素的灵魂对生命价值的探究, 不仅能够唤醒我们的童年记忆, 更能指引我们摆脱功利的束缚, 追求更高、更真、更美好的精神生活。因此, 《诗经》的传播和教育, 既是寻根之旅, 也是面向未来的需要, 顺应了人类回归初心、探索自我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朱自清. 外一种诗言志辨 新诗杂话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6.
- [2] 鲍列夫. 美学 [M]. 乔修业, 常谢凤,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 [3]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美学 [M]. 寇鹏程,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
- [4] 朱熹. 论语集注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5] 朱熹. 诗集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6] 胡适. 中国思想史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 [7] 王坤. “温柔敦厚”析 [J]. 文艺理论研究, 1983 (3): 61-67.
- [8] 白振奎. 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散论 [J]. 贵州社会科学, 1999 (3): 77-82.
- [9] 伯特兰·罗素. 中国问题 [M]. 秦悦,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
- [10] 鲁迅. 彷徨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
- [11]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12] 班固. 汉书 [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
- [13] 马飞骧. 诗经缙绎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9.
- [14] 韩高年. 《诗经》分类辨体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15] 方玉润. 诗经原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6] 郭万金. 《诗经》二十讲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 [17] 程俊英. 诗经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8] 周啸天.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
- [19]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讲孔孟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0] 刘毓庆, 贾培俊, 张儒. 《诗经》百家别解考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 [21] 傅斯年. 《诗经》讲义稿 [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 [22] 王国维. 王国维讲国学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9.

(责任编辑: 容媛媛)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LIU Li-xia

(College of Maritim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age,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should not only follow humanistic concerns as well as rational and restrained moral to move people, popular in pre-Qin Dynasty. It should also be innovated. Some values in *The Book of Songs* should be reflected and criticized, cultivated in ritual culture under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such as its education goal for being gentle and sincere, its education to women for being devoted to making a harmonious home. The above proposals should be adopted when establishing education goals of *The Book of Songs*, chapter selection, text elabor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gentle and sincere; prosperity in poem